
城镇化背景下古村落空间生产研究

——以昆明市化成村为例¹

翟羽佳^a 周常春^a 车震宇^b

(1. 昆明理工大学 a. 管理与经济学院, 云南昆明 650093; b. 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在快速城镇化发展的背景下,在资本逻辑和权力的推动下,村落社会正经历着“去乡土化”“村落的终结”等问题。运用空间生产理论,以昆明市化成村为例总结了古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的空间生产过程,研究发现古村落空间生产的结果是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以各自利益为导向相互作用的结果,其中政府和开发商占据主导地位,由此带来城镇化过程中地域文化丧失、社会空间结构分异等问题,从而提出古村落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保护更新策略。

【关键词】:城镇化;古村落;空间生产;保护更新;化成村

【中图分类号】:F901.8**【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1-1254(2017)04-0103-06

城镇化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的一条主线,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伴随着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农民不断从农业转向非农业生产,给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冲击。当前,为完成城市化任务指标,中国很多城市急于推进城市化进程,导致土地城市化远快于人口城市化。其中,城市新区多数农村地区已经被城市的扩张所触及,原有的空间样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具有一定历史文化内涵的古村落普遍遭遇到保护与更新冲突等问题。

呈贡新区位于昆明主城区东南面的滇池东岸,距昆明主城 12 千米,是在农业县基础上进行的城镇化,于 2011 年撤县设区。根据昆明市“十三五”新型城镇化发展规划,呈贡新区成重点发展区域,规划总用地面积为 122.87 平方公里,重点推进呈贡新区信息产业发展高地、信息产业核心区建设,打造现代化科教创新新城。预计到 2020 年,城镇人口达 50 万人规模。

化成村隶属于呈贡新区南部的马金铺乡,位于昆明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心地带,交通便利,是滇池流域保存下来的城池格局相对完整的古村落之一,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保护价值,并于 2010 年纳入《昆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当中。化成村既拥有独特的传统社会空间形态,又处于城市扩张影响下的社会变迁中。在十几年的复杂行政区划及发展规划下,原有的空间形态及社会关系变得更为复杂,从而出现地域文化丧失、脱离原住民本体、社会空间结构分异、过度资本化等问题。因此,

¹ 收稿日期:2017-03-10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云南乡村旅游小镇空间生产与重构研究”(51368023);云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扶贫开发影响下云南农村社区空间生产研究”(KKSK201508016);昆明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硕士博士研究生科研项目预研计划“扶贫开发影响下农村社区空间生产研究”

作者简介:翟羽佳(1990—),女,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

通信作者:周常春(1975—),女,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旅游管理研究。

本文以空间生产理论为指导，探究在我国城镇化背景下，在新的社会关系形成过程中，乡村社会各方主体的空间生产动机和行为，从而以新的研究视角来充实城镇化进程中古村落的保护与更新途径，以体现城市魅力之所在。



资料来源：百度地图

图1 化成村地理位置



资料来源：根据卫星地图和实地调研作者自绘

图2 化成村规划简图

一、空间生产理论概述

“空间生产”理论最早由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提出。他认为城市空间不仅作为客观中立的物质存在，更加是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社会产物。之后，大卫·哈维将其发展，把空间看作是资本生产的过程和产物，将资本主义经济与空间改造联系起来，并进行了有关城市化、全球化方面的实证研究^[1]。其中，关于资本积累的不平衡发展理论作为经典代表理论，更揭示了当代空间生产的源动力。

城市化是一个动态的、多层面的社会空间过程^[2]。因此，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进行考察，从政治学和公共管理学的视角看，新型城镇化实质上是权力与空间、资本等要素的互动与重组^[3]。我国关于城镇化进程及城市发展中的空间生产研究主要集中在四个方面：一是从空间生产与资本的关系视角切入，认为资本一方面促进了空间生产的发展，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同时也带来了空间生产的异化^[4-5]。二是从空间实践出发，将城镇化看作是资本逻辑驱动下的空间实践^[6]。在空间改造的过程中，资本作为其中重要的推动力，过度追求空间生产带来的经济利益，从而产生了空间的不平衡性等问题，忽略了空间公平与正义。三是研究城市空间生产过程。通过分析城市空间物化特征、意识形态生成过程等^[7]，认为城市空间生产过程是从物质空间生产到社会关系生产的转变过程，对应社会关系的再造形成过程^[8]。四是从农村角度探讨了其空间生产过程。通过讨论农村社会空间与社会关系的之间的联系，发现农村转型变迁规律和运作机制^[9]，揭示资本权力不平衡^[10]村庄集体记忆的衰退等问题。

不难看出，空间生产理论在有关城市发展和城镇化的研究中得到了广泛关注，对于农村空间生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中村这一特殊空间场所。而本文则以城市新区扩张所触及到的历史古村落为研究对象，从空间生产理论的视角来研究城镇化进程当中空间形态的社会变迁过程。一方面，化成村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保护价值，拥有独特的社会空间形态及与其紧密联系的乡村社会秩序；另一方面，这一村落正面临着被城市化吞没的考验。如何能将传统空间与现代空间融为一体，保持它的真实性、整体性和延续性，成为新区建设的重中之重。

二、空间生产的动机

从空间生产视角看，在不同历史阶段，古村落空间的生产已经成为社会形态变迁的方式，并借助空间对资本的巨大吸引力，

结合政府强力推动了城镇化进程。其中，化成村空间生产的动机是行为主体——政府、开发商和居民——共同契合的结果。

(一) 政府动机

政府需要协调城市、政府、人民利益综合最大化。城市扩张所触及到的城市边缘乡村地区承载了城乡二元发展、人地环境冲突和可持续发展转型等多重矛盾，政府作为国家权力的代表，首先有责任对这些村落进行改造，从而使得人居环境得到改善、人地矛盾得到缓解、历史建筑得到保护，并使得村落功能得以更新并实现可持续发展转型。昆明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区落户于此，根据云南省委省政府的“现代新昆明”战略构思，这一区域“最终将建成以高新技术产业为基础，集工业、研发、居住、商务、旅游、休闲等功能为一体的综合型工业新城区”^[11]。而化成村位于规划范围内，其物质环境已无法满足规划要求，政府对化成村进行具体规划以适应总体规划布局。其次，作为行政机构，为满足自身利益需求，政府通过招商引资和对除农业用地之外的生活居住用地征收，获得财政收入。同时，政府还可以通过将基础设施建设，如路面整改、历史建筑保护等，转嫁给开发商，从而减轻财政支出负担。再次，政府为维护人民利益，制定规则以平衡开发商与人民之间的利益关系，维持社会稳定，并通过规划改造，村民迁入新居，生活条件得到改善。

(二) 开发商动机

开发商动机是追求资本增值、利益最大化。随着中国土地市场逐步形成，土地的投资价值凸显。高新区进驻呈贡新区以后，规划新区内的土地升值潜力巨大，大大调动了开发商投资积极性，为追求资本增值、利益最大化，众多企业进驻此地，投资建设新型社区、化成村改造等项目，欲深入挖掘化成村文化底蕴，与旅游资源相结合，打造昆明城市文化后花园。

(三) 居民动机

居民动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通过规划改造，居民将迁入新型社区，周边生活配套基础设施将更加完善，并且通过打造生态旅游服务市场为一体的多功能小城镇，可以通过经营以农副产品交易、商贸及餐饮、修理等个体经济为主的第三产业，增加当地及周边居民就业收入。

三、空间生产的行为

政府运用其权力保证城镇化顺利进行。首先，确定空间定位；其次，引进开发商投入资金，开发商则完成空间从设计到建设的全过程，而居民需要出让其建筑土地并获得相应赔偿，从而配合政府政策。

(一) 行为关系

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之间的相互关系分别是管理、保障、合作和交换关系。其中，政府为开发商提供基础资料、进行房屋征收拆迁等，开发商则提供资本支持，进行开发建设；政府通过征求群众意见建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保障居民合法权益，居民需要配合政府政策进行搬迁；开发商提供资金等补偿来交换居民原有的生活空间。

(二) 行为过程

化成村传统空间形态从时间维度上是从建制开始到上世纪四十年代，其选址和建制格局均受到风水思想的影响，形成了龟型的城池构造，象征稳定和长久。具体到空间格局。虽然化成村内新旧建筑交替更迭，但村内至今仍保留原有道路结构。其中，主干路有四条，主体建筑布局以穿心阁为中心，由于阁楼供奉着魁星神像，也称为魁星楼，始建于1879年，是昆明市级文物保护单位。阁楼周边分布着具有元、明、清建筑风格的寺庙和一定规模的古民居建筑群落，被喻为“一阁七寺古归化”，属于该村以前的公共建筑。这样的空间格局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并反映到村名的社会行为模式中。此时，该村的空间

形态与社会秩序是相互契合、相互转化的。一方面，街巷是村内公共活动和重要仪式的场所，特别是在穿心阁附近十字街巷村民互动最为集中，成为村民之间互相联系的公共场所；另一方面，重要传统活动——香灯会也在化成村街道举行，村民一起祈求神灵，属于全村性的公共活动。

自建国后至上世纪 80 年代，国家权力开始渗透到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去，化成村空间格局开始了剧烈变迁，其传统空间形态被改造成了政治空间和意识形态空间。此时，该村空间变迁的逻辑变成社会秩序支配和生产空间秩序。作为在高新区技术产业园区规划下的历史古村落，化成村成为在资本逻辑与权力逻辑作用下保留下来的独特空间景观，作为“古滇文化的代表”而被打造成“历史文化旅游小镇”。

与全国各地的城市扩张一样，被新城扩张所触及的村庄必然会涉及到对原有土地资源的征收。在开发区进驻初期，主要征收农业生产用地，到了新型社区建设规划及古村落文化开发规划出台之后，居住用地在内的整体聚落空间被纳入征地范围。这一发展定位过程是根据决策者所规划的蓝图为依据的，规划者掌握着政策决定权、土地征收权和其他相关行政权，加上资本强势介入，化成村的空间生产在外力主导和支配下向前推进。随着高新区的进驻和一系列项目规划的实施，该村空间表象分别经历了“明星小城镇”“新型社区”和“旅游小镇”（见表 1）。

表 1 化成村空间生产过程

时间	空间表象 (规划 蓝图)	空间实践 (物质空间生产)	再现性空间 (社会关系生产)
80 - 90 年代	明星小城镇	房屋翻修，道路改造，古建筑减少，功能型建筑、基础设施增加，村落范围扩张等	权力“空间化”，权力主体之间不平等，外来人口增多、居民异质性，邻里关系变得疏远
2009 至今	新型社区	土地征用、高新区进驻、新型社区建设、配套基础设施修建、商业经营活动增加等	
2012 至今	旅游小镇	古村落重点保护项目	

四、空间生产的结果

从宏观空间形态来看，化成村传统的空间形态代表了与城镇化、现代化节奏不符的“落后”状态。因此，在规划定位中，改造成一个多元化旅游小镇，集商业、文化、娱乐、居住为一体，使其空间意义与周边工业园区、城市社区相匹配，而民间信仰、村落文化、乡规民约等精神性和意义性的传统社会形态受到冲击和削弱，趋于同质化、去地方化。

从微观空间格局看，随着高新产业开发区的进驻，化成村村内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随之引起空间使用功能发生分化，进而侵蚀传统空间样貌。根据规划目标，本该受到保护的古滇文化景观在规划实施之后却产生了相反的结果，一些传统空间样貌受到破坏。一方面，大量农地被征用，失地农民就业方式及收入来源发生变化，如投身各个建筑工地打零工。据某村民介绍“征地前，家庭收入来源靠种蔬菜、水果，年收入近 6 万元左右。但受整体经济增长放缓影响，城市发展步伐减缓，很多建筑工程停工，就业机会减少，影响了收入”；另一方面，开发区的建设带动当地商业活动，有条件的失地农民在村子外围和中间东西走向的十字街沿街开起了各类商铺，从事经营活动，形成了主要商业区，而街道中间部分则形成商住相结合的居住空间结构。但一些村民为了改善居住条件就将老房子翻修成新房，也有一些临街道的房子进行装修作为铺面或租给外来务工者增加收入，随着这些新房子的修建，村内的道路越来越窄，并且由于没有完善的地下管网，污水等直接排放，污染了街道环境，最终形成了村落风格不一，建筑参差不齐的空间形态。

五、对城镇化过程中空间生产的反思

通过对化成村空间生产过程中各方主体动机、行为及生产结果进行研究，反映出我国古村落在城镇化推进中的诸多问题，并有助于深入分析相关问题的内在原因。

（一）权力“空间化”，行为主体地位不平等

权力“空间化”是指权力在空间扩张过程中，为空间服务并为资本介入提供保障。我国城镇化进程主要是在以政府为主导，以土地为资本的背景下展开的。一方面，地方政府是掌握权力的主体，它的强制性表现在对个人、空间资源等客体的控制权；另一方面，主客体之间的互动过程也包含在这一不平衡的权力关系当中，以及客体在面对这种不平衡关系时的博弈过程。其中，村民与政府的权力关系在化成村开发过程中主要是围绕土地和房屋的产权问题展开的，并进一步延伸到村民的经济利益。在这一权力关系的博弈过程中，村民利益缺乏制度层面的保证，原本属于村民的生活空间逐渐演变为城市空间的不同功能分区，政府与村民的权力关系在此过程中逐渐“空间化”，原本的社会秩序遭到破坏，导致空间正义缺失、空间发展不均衡等社会问题。

（二）空间同质化，规划设计与实际脱节

从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角度出发，当“空间”成为商品时，开发商往往通过选择较为成熟的开发模式，把规模化、标准化的高效生产方式应用到村落空间生产当中。因此，村落的改造将不可避免地同质化，加剧了城市面貌趋同。同时，在当前城市化推进的规划设计中，空间结构均受到政府和规划者的统治和支配，以致人们切身体验的真实生活正逐渐被设计的空间表象所替代。

（三）古村落历史文化价值模糊，缺乏保护规划指导

古村落的历史价值对于体现城市魅力、提升城市文化品位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然而，众多城市新区建设则面临缺乏文化底蕴、千篇一律的质疑。一方面，由于自我衰败、缺乏足够重视，古村落的历史文化内涵逐渐遗失，对古村落原真性和整体性的理解造成了障碍，导致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对其地位功能的削弱，原有活力的丧失；另一方面，由于缺乏保护规划的指导，导致古村落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盲目性和无序性，难以满足城市文化特色的诉求，更难以体现城市空间发展与历史演变的有机联系，村民真实的生活状态也在城市建设发展过程中被悄然隐去。

六、空间生产机制下古村落保护更新策略

通过上述对化成村空间生产过程中行为主体间动机及行为结果的分析，从古村落建筑、街区的空间形态、社会职能与变迁逻辑根源入手，针对化成村古村落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提出以下保护更新策略。

（一）加大以穿心阁为中心的历史遗迹空间节点的辐射和带动作用

古村落在城市建设和社会发展过程中衰落，主要是由于其原有功能、文化生活与当前时代不吻合。因此，古村落的保护要全面展示其多元化的历史风貌，更新其功能、文化生活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如挖掘化成村文化底蕴，促进文化与旅游资源相结合，体验新中国建立初期的南国小镇。此外，早起社会学中国化进程中两个主要学术流派——“魁阁学派”和“文庙学派”发源于此，对国内外社会学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深度发掘化成村历史文化底蕴，增加极具古村落风貌特征的基础建设，从而增加其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提高居民及游客驻留时间，以促进原住民空间与周边空间社会关系的交流和融合。

（二）以深入调研为基础进行开发规划，增强居民主体意识

在空间正义的研究中，“地方”是介入文化政治的特殊切入点，也是确立空间构建主体性的重要途径。然而，为了避免城市发展类型雷同与同质化，需要认识到“地方”与“地方认同”在城镇化进程中的互动特征，以及不断加深“空间差异”和不断增强“空间联系”。因此，加强对当地物质和非物质文化的调研工作，真实记录和传承当地历史文化要素，为整个开发规划工作提供详实依据，这不仅是公众参与保护地域文化的有效手段，也是延续原有社会关系的重要途径之一。

(三) 实行网格化服务的社区管理模式

城镇化快速发展使得当地居民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外出创业经商、在辖区公司工作的居民数量不断增加，带来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等问题。采用网格化的社区管理模式(见图3)，切实服务好社区内特殊群体，广泛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回应居民诉求，及时化解矛盾纠纷，构建上下联动、条块结合、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服务网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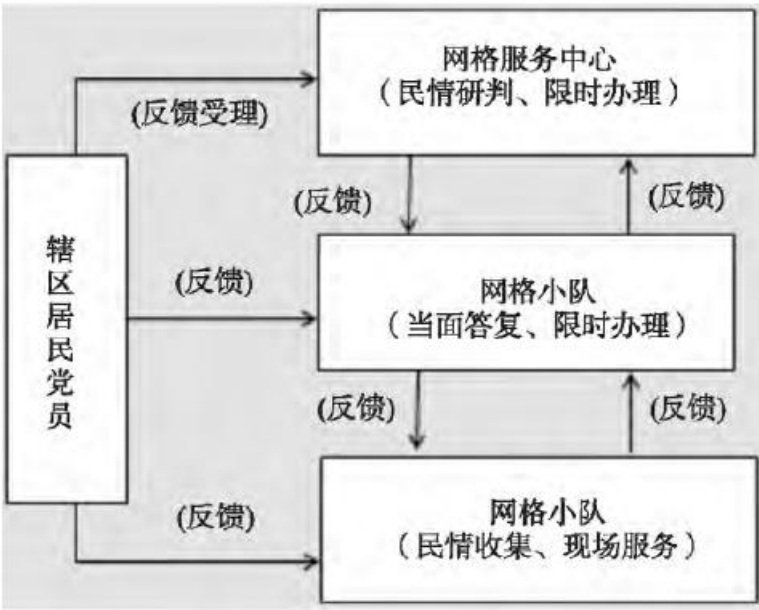


图3 网格化管理流程图

化成村的空间生产过程体现了权力和资本在现代化、城镇化背景下乡村社会的空间实践过程，与工业化、城镇化相并行。这种空间生产在产出城市空间的同时也引发了很多问题。在以政府、开发商和居民三方利益为导向生产过程中，政府和开发商占据决策和行为的主导地位，决定着村落空间物质形态特征，但这一特征生产过程会带来村落传统空间的象征意义消失，也就是哈维所说的现代空间的“符号的贫困”，这同样也是中国农村社会转型所面临的问题。

参考文献:

[1] HARVEYD.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M] . Blakwell, 1985:15—16.

[2] FREIDMAN, JOHN. Four Theses in the Study of China’ s Urbanization [J] .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2006, 30 (2) :440—451.

[3] 钱再见.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的政府职能转变—基于空间权力视角的分析 [J] . 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 2013 (5) :15

- [4] 尹堂艳. 从空间资本化看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定位 [J]. 中共四川省委党校学报, 2013(4):50—53.
- [5] 郭文. “空间的生产”内涵、逻辑体系及对中国新型城镇化实践的思考 [J]. 经济地理, 2014(6):33—39.
- [6] 武廷海. 建立新型城乡关系走新型城镇化道路:新马克思主义视野中的中国城镇化 [J]. 城市规划, 2013(11):9—19.
- [7] 崔翔. 论城镇化进程的资本逻辑与空间生产 [J]. 人民论坛, 2014(14):81—83.
- [8] 庄友刚. 空间生产视角的资本批判及其对当代中国城市化发展的意义 [J]. 东岳论丛, 2012(3):56—62.
- [9] 刘珊, 吕拉昌, 黄茹, 等. 城市空间生产的嬗变:从空间生产到关系生产 [J]. 城市发展研究, 2013(9):42—47.
- [10] 王勇, 李广斌, 王传海, 等. 基于空间生产的苏南乡村空间转型及规划应对 [J]. 规划师, 2012(4):110—114.
- [11] 郑凤康. 抓住促进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呈贡县马金铺乡加快小城镇建设的调查 [J]. 云南农村经济, 2001(5):95